

季塔连科论中国社会主义现象^{*}

〔俄〕米·季塔连科^{**} 李 燕 康晏如编译

提 要 | 季塔连科院士从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争议这一话题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前景,揭示了与中国文化特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丰富,展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及其实践运用,论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建立公平社会和共同富裕社会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将催生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新现象。

关键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民族复兴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 K207.8

译者信息 | 李 燕,女,1966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访问学者,100732。

康晏如,女,1981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100732。

不久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撰文,对当今世界尤其是俄罗斯学界围绕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各种观点和争议进行了梳理,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特点的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该文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象这一理论问题,并论述了其发展前景。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争议

在中国之外的汉学家、政论家以及那些对这个神秘国度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中间,长时间争论着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建设的是怎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向何处去?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对这个独具特色的大国的国情有深

入了解,在作出判断与评价时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对事物的认知,有一个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过程。在人们通常的意识中,一般将从一个国家表面现象和事实得出的认知视为“知识”,用来理解该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进程。不过,这种“知识”并不能从本质上解释产生各种“事实”的现象和原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同内部反动派及外部侵略势力长期斗争中作出的真正选择。因此,普通的知识,在“表象”层面的知识,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个人、社会 and 历史文化

^{*} 本译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编号:14FDJ001)之阶段性成果。

^{**}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本文原载于〔俄〕《远东问题》2013年第2期,第3~24页。

等事件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知识”只能造成一些错误的印象：那些希望尽快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将“摸着石头过河”战略和广泛利用市场机制，以及运用资本主义管理、分配方式视为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指责这是“复辟资本主义”；而那些把中国看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追随者的人，则把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手段和分配方式认定为中国正在“复兴资本主义”的证据。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哪些特殊性，中国如何发展、向何处去等问题给出相应的答案，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从整体上看，这个国家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必然选择？为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将采取怎样的战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在后来消除“文化大革命”消极影响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经常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中国是否达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借用列宁的话，就是中国在主客观上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在作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时，中国的领导者记住了列宁晚年的教诲：“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文化大革命”之后，面对非常困难的局面，中国领导人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以及本国的经验与教训，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从而结束了“四人帮”所鼓吹的“贫穷的平均的社会主义”神话，实质上把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小康”社会作为首要目标。在当时乃至当今，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国外分析家认为，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倒退，甚至有人指责其为“复辟资

本主义”。每当将要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总是十分激烈，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情况亦是如此。特别是，一部分外国的分析师和观察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持怀疑态度，甚至一些中国的干部和科学工作者也因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以及出现诸多很难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的现象而产生了疑虑。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引导社会进步力量，首先是党的干部同那些不健康的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此，江泽民曾作过明确论述。他指出，近年来，中国思想政治领域的形势总体上是有益的，但在社会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一些人公开鼓吹“不断西化”，在政治上主张取代或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推崇多党制和西方的议会民主；一些人宣扬在经济领域实行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和按劳分配原则；一些人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在价值体系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他们歪曲党和人民斗争的历史，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上挑唆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还有一些人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歪曲和攻击我们党的基本政策等。^②同时，中共领导人也看到，党和国家官员中间的腐败尤其危险，腐败已被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一个最大威胁。此外，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与反对意见也在积聚，随着富人与穷人、城市与乡村、发达沿海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7页。

② Цзян Цзэминь О социализме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М., 2002. С. 63 - 64.

巨大成就的同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以及许多阻滞前进的困难和障碍”^①——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肯定了各种矛盾和困难的存在。

众所周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曾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乍看起来,当今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中很多现象已经违背了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同时,在各种思想交锋过程中,人们往往提出一些具有原则性的疑问:中国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道路?怎样才能解决所出现的矛盾?在中国能否实现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等等。从中国的国情以及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形势看,这些争论的出现都属于正常现象。事实上,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它所走过的道路,既不能局限在传统社会主义概念范围中,也不能纳入西方民主国家市场关系的自由机制框架内。那些外国专家往往透过西方价值观来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或者在苏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来衡量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式。由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争论形成了既有“右”的,也有“左”的观点。总体看,这些观点既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政治进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也没有看到中国领导人所选道路的新颖之处。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既顾及了各个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利益,也关注到全球化所孕育的国际新环境,应当加以全面分析。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特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断言,苏联模式已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不可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联

解体教训的总结和思考很有创造性,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以及在这样一个未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分析,都被视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经典论述的创新发展。

中国理论家的结论与列宁的这一论述最接近:“……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③同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向共同耕作,以及向大规模社会化的农业生产的不断过渡”。中国的理论精英考虑到本国国情,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生长起来的”之论断。在这里,他们避开了那些对于中国的条件来说难以接受的表述,也就是列宁式的国家和经济建设机制(联邦制国家政体、民族自决权、合作经济、从小农直接向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过渡)。与此同时,中共理论家们修正了自己领袖的一些过时的政策方针。毛泽东没能实现工业化,他试图一下子由村镇过渡到人民公社,既没有考虑到经济的(缺乏先进技术和科学的农业生产组织,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也没考虑文化的(存在文化程度低或者完全没有文化的、数量很大的阶层)前提条件,尤其是,也缺乏经过培训的干部队伍。“大跃进”政策和农村人民公社作为极“左”路线,反映了建

① XVIII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ДВ РАН: Экспресс-информация. М., 2012. N. 7.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设“贫穷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加以纠正。邓小平对贫穷的和平平均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把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被称为“小康”社会,或被称为中等富裕社会。借用列宁的话就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低级发展阶段即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高级发展阶段”。^①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迈出的一大步。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不仅为社会主义概念引入了新内容,也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列宁曾对他所处时代的阶级矛盾性质作出判断并加以论证,指出当时的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列宁也号召学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对此,中共领导人予以肯定。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理论家们就认识到,必须允许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下改善经济环境。为此,他们做了以下工作: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保护混合所有制经济;肯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相互作用,采用资本主义管理经验,引入资本主义竞争手段以及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其他竞争与刺激手段。在公共分配体系中既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也保留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方面的私人所有,采取多种分配形式。简言之,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完全消除人对人的剥削,不可能超越社会和财产分化,也不可能消除城乡差距,消除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同时,邓小平还呼吁人们,不要被经典作家著作的思维模式所束缚。在1992年南巡期间,邓小平曾作出批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不只依靠专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民主协商手段,以社会关系和谐为目的,建设和谐社会,而满足人自身及其合理的经济及日常文化需求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蓝图的同时,中国的理论家们还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道路选择的保障。1979年3月,在为中共理论战线工作者所作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从中共意识形态角度明确定义了四项基本原则。如今,中共又把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补充进来(补充在第四项中),这些都被视为纯洁党的队伍以及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的保证。在说明为什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现实理论选择时,胡锦涛阐述了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第二,社会主要矛盾还没有改变,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

上述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同富裕及建设社会公正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必须强调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口号落到实处,必须考虑到国家独有的社会经济、人口、历史文化特性,还有大多数公民的心态。这一路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看到,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如何根据各自国情进行实践,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是苏共和中共两党激烈争论并构成意识形态分野的话题。实践证明,把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列宁主义的论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具有其迫切性及历史合理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和各种国外经验教训的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战略战术抉择方法论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前提之一。

辩证反思“解放思想” 与“和而不同”

中共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的路径,是引发各种不同观点和评价的关键问题之一。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能够真正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任务。另一些人则否定中国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对其是否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适合这个社会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并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承担起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存在怀疑。他们断定,所有关于社会主义与改革的话题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使中国滑向资本主义”,实质上是渐进性的“进化”,是要“根本改造中国”成为一个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体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看到了改革过程中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特殊性,不过,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不同认识:一些人把这种特殊性视为中国特色的体现,另外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国家危机,以及社会主义将要瓦解的反映。此外,还有一群支持“根本改造中国”的人,甚至把当代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成果说成是“言过其实的”,是“国家崩溃”的先兆。

这次辩论的结果是,邓小平这位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党和国家任何职务的人,进行了一次南巡,在深圳经济特区发表了讲话。他这样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此为前提,邓小平同时呼吁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积极地引进股份制方法,加快营造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竞争环境。在那之后,“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

被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而在更早些时候这是被当做一般说教的。这与中共重新看待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党内活动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有关。中共从意识形态词汇中剔除了有关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内容,而不断强调“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国际关系和睦”。总而言之,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摆在第一位,运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手段打击潜在的和被臆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不同,邓小平把“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了第一位。这表明,当今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完全是根据不同观点和分歧,运用政治的和教育的手段,力图在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解决问题。

那么,什么是“解放思想”呢?问题不仅仅在于揭示“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内涵,还要认识其方式方法,重新认识当今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

中国所有时代的革命者都曾经遇到并且以后还会遇到非常复杂的方法论问题。一方面,他们处在儒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强调历史传承,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称“温故而知新”。在方法论上,崇尚类比式思维,寻求和谐、中庸之道,在分歧中达到和谐和统一。由此,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不是创造,而是“和谐”,如孔子所倡导的“中庸是最好的美德”。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的任务却是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换言之,中国领导人的任务是如何在革命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把传承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于是,从19世纪起,直到现今,中国所有的革命者和改革家,如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都曾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在当代中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思想主张,把它们放在本国的条件下,在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新理论,由此推动经典理论的现实化,是中共领导人的责任。

概括起来,“解放思想”这一号召具有深

刻的思想渊源和多种现实含义。肯定邓小平的主张,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就意味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正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一系列新问题,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内容,立足国家现实情况,来制定具体道路、规则和方法、措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里所说的确立统一的思想原则,也即说,首先要克服“文化大革命”的沉重后果,拒绝“两个凡是”的言论。这项新原则意味着恢复国家、经济、党和文化生活的健康状态,给成为“文化大革命”牺牲品的中共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平反。在这过程中还恢复了党内的集体领导、国家的法治,并消除了诸多与“僵化思想”有关的丑陋现象。“解放思想”在当时具有极其突出的现实意义与实际效果,它还意味着在实践中明确地借用美国实用主义,提倡竞争,以及在基层采取劳动激励措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以及农业生产组织的自主权。安徽省农民首创“包产到户”的行动就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结果是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在随后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对苏联经验加以批判和重新审视,不再采用国民经济的计划一行政命令方式,正式宣布实行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系统的五年计划被保留下来。此外,中共十八大还强调,统筹规划仍具有重要意义。

现实证实,合理计划有其必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只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也有。胡锦涛也强调,计划是深化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方法。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利用市场关系的批评者不断看到的只是采用市场机制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即其在就业和工资方面带来的激烈竞争,这的确与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完全不同。只是他们没有或者不愿看到那些正面的积极效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迅速提升,还有与此相应的,大量投资带动了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特点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被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众自治制度。多种成分的经济和社会公有占优势的多种所有制分配形式共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总体看,这就是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说:“……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①据新华社2013年2月4日报道,到2012年9月,在中国已登记注册的私人企业有1059.8万个,与2011年相比增长12.6%;个体私营业主达到3984.7万人,比2011年增加7.8%。这些企业注册资本总额超过18900亿元人民币。根据官方统计,2012年非国有部门占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在宪法中明确了通过合法生产和服务手段获得的各种私有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肯定了国家在多种经济形式条件下的多种分配形式。

在2012年3月召开的第12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总结报告中,作了关于社会支出数字总量的报告。在5年支出中,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经费是7.79万亿元人民币,用于科技事业的总量为8729亿元人民币;社会住房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工农业中引入信息化系统,政府财政拨款44700亿元人民币,用以保障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增长,以及

^① Ху Цзиньтао Доклад XVIII съезду КПК. ИДВ РАН: Экспресс-информация. М., 2012. С. 36.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5年间建设1800万套社会保障住房,改建了1200万套生活小区住房,实现了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2.9平方米和农村人均37.1平方米;中国的轻重工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一位;在基础设施环境方面中国做了巨大的工作,水利灌溉面积达到770万公顷;修建了19700公里的新铁路,其中包括8951公里的高速铁路;新建60.9万公里的公路,其中包括4.2万公里的高速路(中国高速公路总长接近10万公里);新建了31个机场和万吨级港口泊位602个;森林植被增加了2953万公顷。

中国经济有效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过程,同主要发达国家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中国的政治家多次愉快甚至骄傲地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正是依托全球化,中国才能战胜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朝鲜以及很多非洲国家乃至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从2011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处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开始成为掌握数量最多的黄金外汇储备的国家,并且与美国持平,中国还成了全球主要贸易大国。

中国经济大规模多领域地综合发展,一方面使得中国变成很多西方工业品牌遍布世界的“加工工厂”,走向其工艺的再生产,但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身的创新发展。尽管中国与美国一样,变成了吸引外国投资的功能强大的磁场。但是,这些投资对于国家用来转变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机制与结构,以及走上创新发展之路的实际效益水平,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看,还是相当低的。专家们认为,经济的浪费和集中并未反映在质量的提升上,而只反映在生产规模数字的增长上。同时,在中国周边国家投资的集中,造成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争取这些投资而竞争,中国把自己说成是他们的保护者和主要力量。

因此,可以说,最近30多年来“解放思

想”的大量创造性工作,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形成了多种结构、多种成分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不仅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制度,同时也大规模利用并发展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财产所有形式和分配形式,在经济调控以及社会主义的文化管理方面也得到发展。在推行现实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认为,当今多种成分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估计要有几十年。

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看,在这个阶段要消灭剥削、消除社会财产分化还是不可能完成的。同时,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国领导人所明确的那样,随着经济文化条件的成熟和人文程度的提升,最终,社会主义的政治还将走向加强社会公正与民族关系和谐。

在这些目标中,把个人利益和保证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放在第一位是重要的一步。同时,中国确立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巩固权利基础,协调城乡关系,加快城市化,采取措施消除贫穷,取消农业税,在农业地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的教育和卫生保健体系,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这些政策可能孕育着国家发展中的历史性突破。根据相关报告,2012年中国已经从农业—工业国跃进到工业—农业国行列,城市居民人口数量大约占52%。不过,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讲的,很遗憾,中国依旧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没有改变。^①当然,中国完全有资格列为“最先进的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如何对待发展生产力问题上,“解放思想”也同样重要,一个原因是,中共十八大直接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居民生活水

① Ху Цзиньтао Доклад XVIII съезду КПК. ИДВ РАН: Экспресс-информация. М., 2012. С. 36.

平提高挂钩。十八大所确定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任务——在2021年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要翻番。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完成这个目标的现实性,并且可以相信,将建成的是一个中等富裕的社会。这就给了学者们正在进行争论的两个问题以正面回答:中国是否会沿着建设正义的和谐社会继续前行?在这个和谐社会中人的幸福是否能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这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的。总体上看,中国沿着未经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直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谈到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时,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这个总数超过8200万人的党,^①在今天顺应时代潮流,也顺应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了深刻转变。

首要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组织基础变了。一些有关党的思想—组织基础、领导方法乃至制定党的战略战术手段的具有创造性的内容,被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在集多种经济与社会结构于一体的条件下,要保证中共起到高效领导和管理作用,就必须明确地对党的思想—组织体系进行重大修改,以扩大中共的社会基础。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以党的名义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正适用于解决党的重大任务。根据这一思想,中共应成为中华民族最先进的代表的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党,作为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中国文化的党。“三个代表”思想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它是作为领导工农联盟的先进社会力量、先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先锋队,还在于它是中国绝大多数爱国力量,以及联合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共同思想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维护、坚持

并推动全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文明和思想繁荣,团结中国各民族之执政党的地位。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依据,则包括中国传统的有关发展的周期性起伏波动性之说教,这是从《易经》和古代孙子兵法中所得来的教诲,教给人们利用有利的和不利的机遇,减少阻碍因素。

制定并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组织—管理与方法论原则,以及改革并完善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思想—组织基础等方面的新发展与新贡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以及社会、思想和组织基础,以适应新形势,解决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在多种成分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内部结构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在这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使得中国领导人能够沿着现代化国家之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迈出新的步伐。

中共十八大对前述四个主要方面做了补充,加上了第五点——生态环境文明建设,这一决定具有突出的紧迫性。由于经济发展的粗放性,缺乏有效监督,有些地方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专家对此提出了警告,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已处于“生态灾难的边缘”。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结果,只有不到1%的中国大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BO3)的标准。土壤污染程度也是这样,90%的被污染的水没有很好地净化就被饮用。工业废料倾倒入江河里,导致长江和珠江被污染。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这将给太平洋造成“沙漠化地带”。在一些地区,围绕保护环境、森林植被、清洁水源,以及同污染和荒漠化的斗争等问题出现了争论。

21 世纪之初,生产力的快速粗放增长和

^① 根据中组部最新统计,到2012年底,中共党员总数已达8512.7万人。——译者注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高比例的积累(超过60%)、各阶层劳动者的高强度劳动。在此期间,克服城乡巨大差距,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标准,保证教育、医疗之类的问题没能被放在第一位,也没能对出现的问题予以及时解决。不过,改革30年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均收入提高了16倍,明显超出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目标——在2000年前居民平均收入达到800美元的标准。如前述,中共十八大确定了国内总产值和居民平均收入翻两番的实际目标。2011年中国的国内总产值达到了47.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7.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居民平均收入接近4000美元。在发达省区,尤其是在直辖市,这种提高十分明显。例如,在江苏省,2011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为26341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为10805元人民币。^①

关于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促使一个新的关键问题被提上日程——必须根据新形势、新问题和新的时代精神制定党的政策和战略,创新方法。在“解放思想”、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党的战略与实践方法过程中,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中把科学发展观单独列出来,乍看起来会令人感到有些困惑。要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哲学思想,自然也囊括了有关以唯物辩证法规律为支撑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发展和延续的内容,它们是全部理论学说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过,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尤为重要的内容,必须加以阐释。可以说,在当代,把科学发展观摆在第一位,是基于其创新性与实践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等原则来考虑的。

首先,这是一项引人关注的理论成果。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同时开启

不同于旧有模式的全新内容的经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要求抛弃各种貌似科学的“主义”,并通过目标明确的努力来获得积极的结果。“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方法就没有用“主义”加以限制,且任何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干部都能理解,哪怕他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然而,在社会中还是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情况,即得到的结果还未经深思熟虑就被解释为已经证明正确性的实践,这种作风被称为“实用主义”,而这一作风与邓小平的说法是相矛盾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部分党和国家干部在实行改革过程中把效率、准确性、执行力与实用主义相混淆,在改革过程中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系统研究,片面、狭隘地理解作为检验真理的实践这一标准。实践本身不是被理解为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活动相互联系的有机综合,而只是被理解为体现现有工作效率或者经济指标的数量上的增长。对实践的这种理解,狭隘地集中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数量的提高上,而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要素则被放到次要位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单方面追求纯技术的、眼前的、技术经济的、注重生产力发展的数量的理念,而忽视了人——包括工人、技工、工程师、生产管理者等劳动者,从而扩大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挫伤了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积极性。在此情况下,正是科学发展观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其次,单独列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在本质上是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很明显,科学发展观既被解释为重新阐释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又被解释为重新理解现实推进社会主义目标的新经验和新的可能性之要求。从对发展过程自身及其规律性的阐释,以及对

① Цит. по: Цюши. 2012. N 20. С.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本质认识上,都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创新。理解这个问题,首要一点就是重新审视在多元化社会发展这一过渡时期条件下,基本的辩证发展规律运动过程。现实证明,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行发展的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的特有规律和辩证联系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构建起一种复杂的平行四边形。在社会生活中同时起作用的,既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矛盾和规律,也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关系所特有的矛盾及规律,甚至还有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和规律。正是这一矛盾综合体和多向发展的规律性,加上一系列中国既有的客观历史现实(人口众多、原有经济文化落后、多民族、缺乏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等),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中国领导人必须统筹考虑所有的矛盾和规律。在确定国家发展目标,选择达到目标的道路和速度,根据新形势转换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所谓多种成分的“矛盾力量的平行四边形”的辩证统一体中,各种经济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一种新的平衡关系,代替了它们之间的斗争,这导致出现一种全新质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样,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方面在当前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演变为社会经济矛盾的和谐化,包括不同事物之间的统一与和谐,即“和而不同”思想,或矛盾消除从而趋同,即“合二而一”、“对立统一”思想。这个过程意味着辩证看待社会发展过程的新重点有所深化,由此,在社会关系的表达中,有关阶级斗争的概念退居次要地位。这种方式不仅运用在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上,而且在理解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也被广泛采用。以此为基础,中国同那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印度等,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平等、建设性对话,相互竞争、

相互作用,形成合作、战略合作伙伴、睦邻友好的相互关系。就此意义说,如果还把中国建立多种经济成分的经验当做中国版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延续,肯定是不合适的。

近期,作为对与外部世界合作、伙伴、相互作用关系特征的回应,“共赢”模式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又一个要素。在实际运用科学发展观概念时,胡锦涛强调,应当注意到“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① 科学发展观完善了原有的改革开放政策方针,并使之与时俱进。新任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时,也把实现人民生活更好的愿望,作为“我们的战斗任务”。按照习近平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个方面是:第一,探索经济发展的科学途径,拒绝盲目的、导致资源枯竭的、没有前瞻性的发展;第二,政治建设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挂钩,政权的行为必须与依法治国、适应宪法要求挂钩;第三,在文化建设上注重培养专业人才,培育民族精神;第四,社会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形成正确的幸福观,为建设和谐社会勤勉劳动;第五,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② 这种表述,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个方面”赋予了人道主义的、人性

①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К КПК XVIII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Решительно следуя по пут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бороться за полное построение среднезажиточ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② См.: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К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итоговой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XVIII съезду КПК.

化的内容,是对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的全部思想的正确总结。

几个基本结论

抛开各种成见,通过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致力于艰苦探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其第一个阶段是社会达到中等富裕水平。在这一阶段,中国将摆脱贫穷和文化落后状况,为建设具有发达人民民主的“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

第二,中国理论家在总结国家现代化、探寻尽快克服贫穷和落后状态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望以及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的经验时,既注意研究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社会主义危机的事实,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经验进行归纳。这些研究和探寻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本质上,这一理论是在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一系列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也曾出现过。二者主要的共同点是为刺激经济发展,允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在国家调控下并存。然而,相似性仅此而已,中国的实践显然要比新经济政策更深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视资本主义因素为暂时的同路者,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平等参与者。在中国,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各种私有制,与公有制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以全体人民和各个阶层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形成的统一战略为基础。这一战略是否正确——将来会显现出来。

第三,总结30多年所积累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可以让中共领导人在中国建立一种新

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将资本主义科技成就和管理经验与建设公平、中等富裕和谐社会的方针结合在一起,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

作为分阶段推进中国国家复兴的复杂而宏大的工程的理论指导,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正在实践中。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完成阶段,正在建设中等富裕社会。对此,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Э. П. Пивоварова)予以充分肯定。她认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突破性,并指出,首先,这一突破符合马克思关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科学预测。为了建立起这些物质条件,中国划分出100多年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①其次,“这一‘突破’使得在实践中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增添新内容成为可能。这种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但是并不符合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印象……”^②皮沃瓦罗娃教授还指出,这将有助于中国社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第四,根据上述几方面内容,可以确定,在苏联解体 and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被怀疑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全球化和处于后工业发展阶段的世界中代表了新的社会主义现象。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重新诠释了民族的、国际的建立公平和全面繁荣社会的经验,这正是人类几个世纪的梦想。首次出现在乌托邦思想中的关于人人平等、公正和富足的社会学说获得了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形式的名称。马克思和

^① Пивоварова Э. П. 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М., 2011. С. 318.

^② Пивоварова Э. П. 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М., 2011. С. 318 - 319.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尝试把这一伟大名称与科学实践结合在一起。后来的思想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葛兰西、毛泽东、陶里亚蒂、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人都尝试发展自己建设新社会的理论。然而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每次都把这些国家引向死胡同。他们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不是超越就是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所出现的社会经济体制变成了社会实验的描图本，没有为公平分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配置好足够的资源。社会财富通常不是陷入庸俗的贫穷的平均社会主义，就是按照干部、官名录的官阶体制进行分配，并以更糟糕的形式重建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分配不公和大规模贪污引起的两极分化。不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现行的社会民主党很善于学习。资本主义经历的20世纪20~30年代大危机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它们接受并发展了苏联的许多创新，西方社会和整个资本主义获得第二次喘息机会，因为发达国家能够比苏联及其追随者从社会创新中挖掘出了更多的措施与手段。

中国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保持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的新尝试。这一尝试力图从总体上适应实现这一理想的经济、文化和文明水平。中国共产党将最大范

围地团结社会进步力量，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过程中起到英明的协调者、管理者和先锋者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文明新模式的继任者和体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新诠释了一个半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客观上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现象与科学和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理论命题的提出，被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学说形成和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形态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发生危机的条件下彰显出自己的前景。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中国往何处去的争论的主要结论就是如此。正如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所讲的那样，“让人民幸福”和“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利益、激励全国人民的集体力量”来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方式和要点可以被认为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的实践，可以说，经典作家这一著名命题完全适应中国条件下的新解读和新运用。

(责任编辑:高 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